

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译

(第一册)

改革出版社

94
F113.9
2
2:1

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

(第一册)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 编译

710091/28



3 0105 1537 1



改革出版社

C 041632

(京)新登字053号

责任编辑 杜 豪

封面设计 刘林林

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译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安德里北街23号)
财贸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125印张 110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ISBN—80072—427—1/F·245

定价：20.00元（全套共四册）

项目组人员名单

项目负责人：高鸿宾

项目执行人：周彬彬 刘毅楠

项目组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卫民 王 甘

尹建华 叶兴庆

刘毅楠 张一明

金 一 周彬彬

高鸿宾 童燕萍

目 录

前言	周彬彬 (1)
走向贫困衡量尺度的第三阶段	斯坦·林恩 (11)
贫困的概念与测量	沃尔夫·斯科特 (32)
贫困的衡量——对于努力确定穷人数量、尤其是印度 穷人数量工作的回顾	彼德·卡特 (52)
贫困衡量中的一些问题	阿马特耶·森 (73)
衡量经济状况、贫困和不平等	罗伯特·哈夫曼 (96)
衡量贫困的社会学——反驳阿马特耶·森教授	彼得·汤森 (123)
衡量贫困的社会学——对彼得·汤森教授的答复	阿马特耶·森 (134)
根据食物支出比例衡量饥饿与贫困的一次探索	巴诺吉·拉奥 (142)
加纳的食物贫困剖析及分解	斯蒂芬·基雷姆、埃里克·托尔贝克 (174)
肯尼亚小农的粮食短缺剖析	乔尔·格里尔、埃里克·托尔贝克 (196)
贫困的衡量——评家庭规模和收入单位	G·C·菲格亨、P·S·兰斯利 (218)

对英、美贫困线的再探讨·····	唐纳德·钱伯斯 (233)
贫困衡量中的一个问题·····	迈克尔·利普顿 (244)
贫困的衡量·····	(252)
一组贫困指数·····	奥尔迪·哈格纳斯 (263)
论贫困衡量方法·····	A·B·阿特金森 (300)
论衡量贫困的指数·····	
·····斯蒂芬·克拉克、理查德·亨明、大卫·厄尔普	(319)
贫困线的概念和标准	
·····西奥·戈德哈特、维克托·哈尔贝、施塔特、	
阿里·卡普坦、伯纳德·范普拉格	(335)
贫困线——欧洲的一次试点调查	
·····伯纳德·范普拉格、西奥·戈德哈特、阿里·卡普坦	(353)
食物比率贫困线与莱登贫困线的比较	
·····伯纳德·范普拉格、简·S·斯皮特、	
赫伊伯·范德斯塔特	(362)
人名译名对照表·····	(371)
贫困概念与测量标准资料指南·····	(379)

7

前 言

这套丛书一共四本，在我动笔写前言的时候，刚刚完成第一本，另外三本还在编选翻译之中。计划在1992年上半年出版。

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个搁置了很久的计划。1990年初提出动议，在很长时间里，因为某种原因一直被“封闭”起来。以后听说找了几个人译出了第一本，到1991年仲夏，我们看到译文时才知道，由于翻译水平较低，加之文字粗糙，无法成书。而且以后几本书的内容、资料、翻译尚没着落。

我们决定接手干，是因为这是件极有益的事，“黄了”太可惜。虽然做成功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于是，我们确定了成书框架、内容、体例、及分工与工作要求，以推进这项计划的落实。

但1991年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全力以赴筹备10月在陕西省河县召开的“全国贫困山区扶贫开发经验交流会”，会后又分赴各特困山区进行调查，历时20余天，回到北京，已到寒风凛冽，叶落枝枯的冬季。从夏到冬，竟然无暇顾及此事。

根据计划日程安排觉得此事不能再拖了，于是横下一条心，集中所有时间对第一本的译文进行处理，前后一共修改了两遍，几乎无处不改动，无一段不修正。但尽管如此，

由于译文存在问题较多，很难说改后就没有遗漏和疏忽，加上我才疏学浅，根基不牢，对一些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和处理，可能把握不准。因此，译文中的不足之处，应由我负全责，并恳请读者见谅。

为什么如此之难，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努力完成这套丛书呢？主要是为了提高我国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我国从198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计划的扶贫工作。随着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对贫困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也相对多了起来。但这方面的研究和其它学科、专业、行业相比，仍显得十分幼稚，主要围绕着扶贫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缺少理论的基础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及手段。不能说我国社科界这些年对贫困问题不重视，但从一些研究成果看，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研究贫困的文章囿于政策的说法，与其说它是理论性分析文章，不如说它是解释政策的“注脚”。如果我们的文章都是这样，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又能有多大的建树和价值呢？二是把贫困问题和落后地区的区域开发看作是一类的问题，认为贫困问题仅是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开发的一部分。因此，只知从区域的角度，以区域经济为分析框架处理贫困问题，殊不知这只是分析贫困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既可把贫困问题主要是区域贫困问题看作是区域经济研究的一部分；也可把区域贫困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那部分区域经济研究看作是研究贫困的一部分。此中的差别就在于你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研究贫困，还是从贫困的角度涉及到区域经济。这也就是贫困问题研究和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分野。

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理论储备。贫困问题属于边缘学科，涉及到经济、社会、地理、历史、环境、生态、统计等诸领域，仅在经济学这个大类中，就涉及到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福利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计量经济、交通经济、财政金融、人口经济等。因此，它不可能象传统规范的学科建设那样，经过学科自身长期不间断地积累完善，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在贫困问题受到全社会普遍重视的情况下，在各个学科中，都形成研究贫困的热点，并围绕这些热点，不断产生形成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通过相互交流，碰撞、融汇，择优汰劣，一层一层地沉淀下来，构成贫困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由于贫困问题这一学科上的特殊性，推进其发展是有条件的，一是要形成“贫困热点”，再一个就是各有关学科的积极参与。例如美国学术界对衡量贫困的重视是在联邦政府1964年“向贫困宣战”之后。对此，罗伯特·哈夫曼在《贫困政策和贫困研究》中写到，“在30年代，只有以卡尔·齐默尔曼为首撰写了一些关于家庭生活和消费标准的研究报告。但在以后直到1960年，就没有以衡量各种人和家庭以及低收入人口的经济状况为重点的研究工作。”“由于强调平等与强调效率相对立，因此，这项工作一直没能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但在“反贫困战役”开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评价经济和贫困状况的工作占去了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的大量时间和资源。”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成果大量涌现，“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如何衡量收入与财富的关系、智力资本、多年低收入状况、非现金收入、各种家庭的基本需要。”“以此确定全面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可见，“热

点”和“参与”是关键。如果美国政府不是在60年代而是在80年代“向贫困宣战”，那么，随着“热点”向后推移20年，对贫困尺度的研究可能也要倒退10多年。

由彼及此，我国研究贫困问题之所以落后，也是由于没有形成“贫困热点”所致。长期以来，我们只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而忌讳谈论“贫困”二字，这种舆论的氛围和政治上的风险，使贫困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禁区”，有哪个学科敢到这里偷食“禁果”。致此，研究贫困的理论成为理论研究的“贫困”。这种理论研究的落后状态，使我国在反贫困的努力中出现了实践的长足进展和理论政策研究的低水平这种不协调的状况。

理论政策研究落后于实践已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潜在的不利影响。如，应该怎样制订我国的贫困标准，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科学的贫困标准。1986年开始执行的“划分标准”，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也没有进行过最小基本需求的测算。与我国很多需要决断的事情一样，靠的是领导人的拍板决策，当然这里凝聚着长期的领导经验和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力。由于标准不是客观的，仅是一个经验估计值，且要照顾到方方面面，考虑到各种政治因素，因此，“标准”不是一条线，而是三条线，“一般地区，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政治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官方标准”不是一个贫困标准，而是一个扶持标准，是一个由此确定谁能得到政府补贴的标准，具有明显的“安抚”性质。

虽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抨击这种方法不科学，但以民主的程序，科学的方法制订一个贫困标准谈何容易，我们所

遇到的麻烦和美国政府于1964年提出第一个官方标准一样，“当时能够为制订这些标准提供指导的学术文献几乎是空白。”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国“贫困标准”使用的五六年期间，除了地方从事扶贫工作的同志感到此标准有问题，提了不少修改建议，再就是我们委托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做了一个“贫困标准”的课题，就没有多少人来问津此事，甚至来自理论界的“诘难”也很少听到。而美国的“官方标准”一经颁布，经济理论界一片责难之声，批评是多方面的，本书第五篇译文《衡量经济状况、贫困和不平等》，介绍了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但正是在这种“声讨”的喧嚣之中，各种各样有关贫困标准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贫困标准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是福利效用函数理论还是其它的什么？美国的贫困标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按照最经济食物的三倍确定贫困线，这个比例是否合适；经济贫困是指现期收入还是长期收入，应该如何确定测算周期；经济状况是指部分收入还是全额收入，全额收入的指标应该如何确定；如何比较不同结构不同规模家庭的贫困状况，不同类型家庭的“等量比例”应该如何确定；制定贫困标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指标，价值、实物；收入、支出；能力、消费；是单一指标，还是多元指标，或是综合指标；这些指标在测度贫困时的优、劣是什么，是否有克服、修正、替代的方法等。我在这里列出的，仅是一小部分问题的清单，如此之多的问题被提出又被解答，不仅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文献，而且势必推动贫困理论的发展。

因此，从两国贫困标准的经历看，遭遇有同有不同。开始制订标准时“麻烦”是一样的，当然程度上有差

异”。但以后受到的“待遇”却很不一样，美国学术理论界迅速参与进来，改变了过去研究贫困标准的不利局面，社会政治“热点”转变为理论研究的“焦点”，为进一步改善官方贫困标准奠定了基础。而我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依旧冷冷清清，热点不热，参与者寥寥，门可罗雀，研究工作止步不前。如要制定新的贫困标准，“麻烦”依旧，先天不足。

为什么在社会上都出现“贫困热点”之后，我国和美国在贫困理论政策研究上的差异竟如此之大。究其原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尚不知应该如何迈进研究贫困的理论“门槛”，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我们在1990年曾委托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做一个全国农村贫困程度和分布的课题。这个题目的一般解题思路是要解决各种不同类型区如何进行同等贫困程度比较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贫困尺度，该尺度既符合各地不同的消费水平及特点，同时又能界定同等程度的贫困状况。然后，依照这个尺度，测算出各地的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规模，密度；由于“人头法”不能反映出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也就是说对贫困人口的分配及消费差异无能为力，因此，应该辅之以“贫困缺口率”，和可分解的测度方法。一方面可以测算出贫困人口的“总量缺口”；另一方面可以测算出不同贫困群体到达贫困线的距离，不同的差距分布也就是不同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分布。做到这一步如果意犹未尽，还可以对分布的特点、规模、原因进行分析。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处理，而这些技术性问题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研究贫困问题的深入程度。如测度贫困程度，是使用收入指标，还是使用消费指标，或恩格尔系数，选择不同的指标，对贫困程度和分布的影响是什

么，哪个指标更准确。如都不理想，应该在指标上和方法上如何处理。

从课题的完成情况看，说句不违心的话，并不太理想。不用说上面提到的技术性问题根本没有涉及，而且解题的思路也出现偏离。仅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进行测定，而对贫困缺口率，特别是贫困人口之间贫困程度的分布则忽略不计。解题的方向转向贫困原因的分析，如家庭劳动力的素质和数量，土地的数量和质量等。而这方面的任务，应该是在农户行为分析而不是在贫困程度和分布的课题中完成。

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做课题者缺乏对贫困的概念、统计、方法和测量等基本理论的功底，因而也不具有把握这方面课题走向的能力。当然这里面也有应付和时间不够，相对草率等问题。

我们不可能等待很长的时间，期待学术理论界经过长期的努力，把国外已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而是要走一条捷径，把国外的研究成果拿过来，借“他山之石”，提高我国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这也就是我们出版这套译丛的基本目的。

为加强本套书的可借鉴功能。丛书在体例上和内容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在选材上强调为今后从事贫困问题研究提供分析某一问题的“范例”，舍弃大量资料性题材。如国外是怎样分析经济增长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关系问题；如何分析食品价格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问题；就业对贫困的影响；各种人口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就业类别对贫困的影响作用等。这样，有志于研究贫困问题的同仁，就可以直接从这些“范例”中了解研究某一类型贫困问题的框架、

路数、方法，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及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从而较大幅度地提高我们分析、处理各类贫困问题的能力。

提供“范例”的另一好处是，读者可以对研究贫困的方法、成果、结论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仅从一般的介绍中进行学习。这样，不仅可以知其然，而且可以知其所以然。对所学的知识了解得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刻。最近我写过一本介绍国外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书，作为“七五”社科课题成果的一部分。该书曾介绍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及测量贫困的方法，但内容介绍得相当简单，无法与译丛第一本书的内容和知识量相比。

例如，在第一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中，作者把绝对贫困概念，相对贫困概念和用多种福利指标测量贫困看作是贫困概念和尺度的三个不同阶段，并对“绝对”与“相对”概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就远比我在书中抽象出来的几条干巴巴的原则定义生动得多。再如，在沃尔夫·斯科特《贫困的概念与测量》一文中，作者叙述了“穷人的不同定义以及衡量贫困的不同标准，在统计上会产生多大的分歧。”并向我们展示了在营养基本需求，收入指标，测量单位，基期与末期等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各种争论和意见分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使我们可以多角度地思考分析贫困问题，并能生动领略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置这些问题的多样性。阿马特耶·森的《贫困衡量中的一些问题》，是一篇全面阐述这位在贫困研究中做出杰出贡献学者观点的文章，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在后面的几篇文章中，有他和彼得·汤森的争论性文章，由此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国外学者在学术理论问题上的争论是何等的激烈。但从这些针锋相对的争论中，

我们可以得到新的启迪和收获。此外，在一些国别的研究文章中，如对印度和美国贫困线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要制定一个国家的贫困标准，应该注意研究解决哪些问题，并在哪些方面谨慎处理，减少失误。

丛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在体例上。四本书，每本涉及贫困研究的一个或彼此相关的领域。这样，四本书合为一体，大体能反映国外研究贫困问题的基本情况。第一本是有关贫困的概念，调查实例分析和测量方法的研究，全书的文章也依此顺序分为三部分。第二本是从农业的角度研究贫困问题。选译了有关土地占有，非土地资产分配对贫困的影响；技术变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减弱贫困中的作用；价格、贸易条件，特别是食品、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等文章。第三本是有关社会政策，福利政策方面的内容，可分为教育、培训；营养卫生；人口、计划生育；妇女、儿童；保险、社会福利、救济制度等。最后一本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如经济增长、制度变革，就业和就业机会；有关结构方面的问题，如资产结构（要素配置，部门配置），社会分配（分配结构）等。在后三本中，还包括了与该领域相关的反贫困计划、措施、方法，以及经验、教训等。

第二、三、四本的翻译人员分别是：叶兴庆，罗长富、石坚承担了其中的两篇；张一明、童燕萍夫妇；其中金一负责“以工代赈”文章的翻译，王甘。我负责丛书的编审总校对工作。

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丛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全部经费，原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李文彬先生负责了第一本书原文资料的收集、编选工作，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尹建华同志，她为第一本书的修改作了大量的编务工作，并审校了所有的人名，重新编写了人名索引和有关贫困概念、标准、测量的资料指南。应该说，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是难以实现的。在这里，我对所有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劳动的同事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周彬彬

1992年1月3日

• 美国在60年代中期以前，已经有一些大学在从事这方面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美国农业部颁布的“最经济食品标准”，为确定最低营养需求提供了依据；奥姆斯凯和政府中的一些研究分析人员，为最后完成这个标准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美国制订贫困标准的理论准备要远远好于我国。

走向贫困衡量尺度的第三阶段*

斯坦·林恩

在本世纪期间，特别是近20多年来，虽然贫困的概念有了很大的演变，但衡量的方法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从理论上讲，除了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传统概念外，或作为对这一传统概念的替代，又形成了贫困的相对概念。但是在衡量尺度方面，不管用的是什么概念，最重要的衡量手段仍然是收入贫困线，唯一的区别不过是把贫困线定在什么水平上。概括地说，在分配研究方面，虽然早就有人告诫说，不要单把收入作为生活水平的标志，并且已经形成了直接衡量消费即生活状况的方法，但是在贫困研究中却继续使用间接收入法。本文认为需要有另外的衡量贫困的方法，这种方法符合贫困问题的“现代”概念，同时还指出如何把生活条件研究中得到的教训同贫困研究结合起来以形成这样一种衡量方法。

*本文引自《行为社会学》杂志1985年总第28期。作者斯坦·林恩(Stein Ringen)，斯德哥尔摩瑞典社会研究所。作者于1984年2月3日至5日在厄勒布鲁举行的瑞典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和1984年5月21日至23日在乌托举行的关于生活条件统计学的北欧研究会上，提出了本文头几稿并进行了讨论。